

习近平总书记

考察过的文化遗产

武夷山朱熹园：以“源头活水”涵养文化自信

□ 张 恒

“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，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？如果不是中国特色，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？”2021年3月22日，在福建武夷山市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朱熹园，了解朱熹生平及理学研究等情况，提出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，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。

朱熹园又名武夷精舍，是南宋著名哲学家、教育家朱熹（1130—1200年）亲手创办的书院。朱熹祖籍徽州婺源（今属江西），出生于福建尤溪。淳熙十年（1183年）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建起武夷精舍。历史上精舍屡建屡毁，目前所见为本世纪初原址重建。精舍连同周边部分建筑、绿地等称朱熹园，是纪念朱熹、弘扬理学、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。

武夷山“碧水丹山”，“奇秀甲东南”，蜿蜒于山间的九曲溪因三弯九曲胜景被称为“武夷之魂”，武夷精舍便坐落于溪水最深的五曲之畔、隐屏峰下，风光尤为奇绝秀丽，“苍藤茂木，按衍遮靡，胶葛蒙翳，使人目旷神怡以舒”。据朱熹《武夷精舍杂咏序》记载，精舍建有仁智堂、隐求室、止宿寮、石门坞、观善斋、寒栖馆、晚对亭、铁笛亭等建筑，人称“武夷之巨观”。一时学者云集，蔡元定、黄幹等人皆曾从学于此，“讲书肄业，琴歌酒赋，莫不在是”。

武夷精舍时期，朱熹撰成代表作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。他将《礼记》的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并列而成“四书”，取代“六经”作为新的儒家经典；同时改变汉唐以训诂章句为主的解经之法，注重义理阐释，构建起以“理”为核心的体用兼备的精密哲学体系，钱穆赞其“四书”学“于中国学术史上有旋乾转坤之大力”。《四书章句集注》集朱熹理学之大成，是以理学解读儒家元典的里程碑之作，元代成为科举考试的指定教材。

朱熹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武夷山地区度过。基于“武夷山是后孔子主义（朱子理学）的摇篮”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9年将武夷山列



福建武夷山朱熹园内的朱熹雕像

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。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曾给予高度评价，称“这是中华文明的骄傲”。

“国以民为本，社稷亦为民而立”，习近平总书记在朱熹园考察期间，看到墙上印有朱熹这句名言，驻足凝视良久。

“国以民为本，社稷亦为民而立”是朱熹在武夷精舍期间的思想成果，该语出自《四书章句集注·孟子集注》，是对孟子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经典话语的阐释。类似论述在朱熹著述中还有不少，如《大学章句》说“能絮矩而以民心为己心，则是爱民如子，而民爱之如父母矣”，等等。

朱熹继承了儒家悠久的“民本”传统，并从理学视角作出新的阐释，但他并未止于理论，而是深切贯彻于实践，尤以“朱子社仓”的创办最具代表性。乾道四年（1168年）春夏之交，建宁饥荒，朱熹等人“劝豪民发藏粟”，“里人方幸以不饥”。祸不单行，附近又闹盗匪，仅有的存粮即将见底。幸亏官府及时将赈济粮食运达，民众才渡过难关。当年冬天，民众自发偿还官府贮粮。在这些粮食的基础上，朱熹等人提出效仿古法建造社仓，用于丰年储粮、灾年赈济。社仓选址崇安县五夫里籍溪坊（今武夷山市五夫镇兴贤街），乾道七年（1171年）建成，“为仓三，亭一，门墙、守舍，无一不具”。朱熹还专门设计了运作管理体制《社仓事

目》，后被宋孝宗“颁诏行于诸府各州”，成为通行全国的救灾储粮制度规定。

朱熹“登第五十年，仕于外者仅九考，立朝才四十日”，无论在朝还是赋归，他都身体力行民本理念，留下不少佳话，其中蕴含的理学思想、治理智慧和人文情怀至今仍具启发意义。

朱子学发轫于武夷，却未囿于武夷，精深的哲学思想、深切的淑世情怀和卓越的治理智慧使其跨越时空、超越国度，不仅成为中国近古数百年的正统思想，而且东传日韩、西渡欧美，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发挥重要影响。

朱熹一生致力于研究著述、讲学倡道。学术上，承二程洛学，兼北宋诸子，集理学大成，留下25种、600余卷、2000万字著述，“致广大，尽精微，综罗百代”；教育上，毕生投身书院复兴，除武夷精舍外还在武夷山地区创办寒泉精舍、晦庵草堂、竹林精舍等书院，复建、扩建白鹿洞、岳麓等书院，创制学规、讲学论辩、培养生徒，形成著名的晦翁学派（考亭学派）。凭借卓著的学术与教育成就，朱子学元初开始北传，延祐复科后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成为科考教材和标准答案，明初被钦定为官方哲学。

朱子学不仅走向全国，还远播世界。在东亚，朱子学早在南宋后期便传入日本、朝鲜半岛。16世纪

中叶以后，中国朱子学和韩国朱子学、日本朱子学共同形成东亚朱子学，成为“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”。在东南亚，朱子学宋末传入越南，近代又由华人移民传入新加坡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等国，对当地发展产生重要影响。明末清初，朱子学又由来华传教士带到欧洲，经莱布尼茨等启蒙思想家阐释。20世纪以后，美国朱子学研究也出现一波热潮，成为中国文化研究的显学。

习近平总书记朱在朱熹园考察时指出，“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。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。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”的重要论断。

近年来，朱熹故里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和重要指示，围绕朱子文化实施保护、研究、教化、交流、传播五大工程，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。目前，南平已就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、朱子文化生态保护区和环武夷山国家公园朱子文化旅游等编制规划，修建和新建紫阳楼、考亭书院、朱子文化广场等一批朱子文化重要遗存和公共场所，并持续打造“考亭论坛”、“朱子之路”研习营和“大儒朱熹——走进朱子大型交响咏诵会”等重点文化品牌。地方政府的重视引来“外脑”，中国朱子学会武夷山研究基地于2023年3月在五夫镇揭牌成立，推动开展朱子文化研究和学术交流。朱子文化的传承发展还释放出示范效应，茶文化、闽越文化、建盏建本文化、宋慈法律文化等当地特色文化的研究阐释和活化利用正不断推进。

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八百多年前，朱熹在《观书有感》中写下这两句脍炙人口的诗句。如今，以朱子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，成为涵养文化自信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“源头活水”。

世界上有丰富多彩的文明形态，观察文明样式的角度有很多，其中一个维度是一种文明致力于塑造怎样的人，国之教育铸造怎样健全的人格。中华文明对于人的塑造，体现为培育君子人格。人民教师学为人师，行为世范，立君子之志，行君子之德，应有君子风范。

教师作为具备专业技能的灵魂工程师，传授学生各类专业技巧，掌握生产物质产品技能的同时，也要立足于学生的人格教育，重视德性滋养，弘扬博大精深的君子文化。专业知识的学习具有专业性、特殊性、工具性，人格的培育具有本根性、普遍性、思想性。求知先学做人，做人先立其德，掌握君子文化这门大学问，就是扎好中华文化的德性根基、人文根基，在物质水平日益提升、物质资料日益丰富的时代不断充实精神滋养，修学生人生真、善、美的德性伦理大学问。

古之教师有君子风范。师者志在传道，以传习君子之道为教学使命。唐代韩愈有《师说》之名篇，专为嘉奖弟子李子蟠聪颖好学、通习六艺经传而作，其文专论师，“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”。不论贵贱、贫富、长幼，传道、行道者为师，“是故无贵无贱，无长无少，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”。

春秋时期，孔子收徒讲学著书立说，为后世师表楷模。夫子以好学自称，相传六经为孔子整理，子曰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”夫子一生学而不厌志在求道，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，诲人不倦教诲学生成为君子，“女为君子儒，毋为小人儒”。孔夫子教授弟子由知入行、以行促知实践君子之道。人的生存境遇多种多样，德性伦理贯穿其中，是人立身处世的准绳，子曰：“君子谋道不谋食。耕也，馁在其中矣；学也，禄在其中矣。君子忧道不忧贫。”君子谋的是什么道呢？概而言之，是正义之道、仁义之道、信义之道，面对各种各样的生存境遇，物质财富的贫富、人生境遇的顺逆、职位身份的高低，均以道义为价值标准，子曰：“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”君子“素其位而行”，无论是处于富贵、贫贱、夷狄、患难何种境地，都能够得到行道的快乐，“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”。

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”，高尚人性的自我发掘、自我觉醒、自我修炼，是君子教学的基本内容。《礼记·中庸》篇提出了智、仁、勇“三达德”，《孟子》有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辞让之心、是非之心的仁义礼智“四端”之说，彰显人区别于禽兽的先天性德。从人格塑造的角度观中华文明，这一文明的高度表现为“人”的德性高度，成人就是率先天之本性，在日常生活中理解好、运用好德性伦理的行事尺度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成就君子人格。

今之教师应有君子风范，传授各科专业知识的同时培育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，扎牢中华文化爱国、为民的德育根基，弘

教师应有君子风范

□ 任俊华

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君子之学博大精深，非学无以成其道，教师承担起传承君子之道的当代使命。全球化时代，人民教师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，树立民族文化自信的职责和使命。伴随科技革命的推进，互联网走进千家万户，不同文明的沟通交流实现了同频共振，同时，越来越多的学子走出国门，接触到不同地域的文化形式。中华儿女要以文化之基作为立身之本，与不同文明进行交流之时，坚定中华文化自信，彰显中华文化的博大风采，那么君子人格的培育、君子文化的熏陶就显得至关重要。君子之学阐释了中华文明的基本形态。君子文化有精神和物质两个层次，《论语》论君子：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，意思是说质地和文采同样重要。从文明的角度，把人的精神文明建设看作“质”，着眼于个体君子人格的养成；把人创造的物质资料看作“文”，表现为可见的物质形态，比如物质生产方式、经济建设等，君子文化结合“质”与“文”，“质犹文也，文犹质也”，两者同样重要。

“君子不器”，君子博学多才，并非像某种器物一样只限于特定的形态和功能。新时代人民教师应有君子风范，既要教有专长，精研一门技艺，也要博学多才触类旁通，具备丰厚的知识储备，开启当代学生开阔的学习视野，培育德学兼优的综合型人才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，需要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作为物质支撑，也需要强大的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深厚的人文底蕴，人民教师任重而道远，仁以为己任，在培育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育人事业上绽放绚丽的职业光芒。



鳌峰书院：东南第一学府

□ 薛体伟



闽台学缘

清代时，台湾在建省前为福建省辖下一府，台湾书院的发展与福建书院及文化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据《鳌峰书院志》记载，“十郡士膝踰足而至”，“十郡”即为福建原有九府加上台湾府。台湾书院的办学模式，基本仿照福建的各大书院，鳌峰书院制度的影响尤为突出。如台湾海东书

院在学规中要求学生“明大义，端学术，务实学，正文体，慎交游”，这种学风与鳌峰书院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。在人才培养方面，鳌峰书院是台湾学子仰之弥高的求学圣地，招收了不少台湾学子。在人才输出方面，鳌峰书院培养了许多台湾文教事业的栋梁之材。据《鳌峰书院志》记载，从清初至嘉庆十二年（1807年）间，出身鳌峰书院的台湾地方教育官员就有叶梦琴、吴玉麟、陈清言等9名。

在清代，省会书院作为其他书院的典范和官方样本，由皇帝亲自下诏建立的最高等级书院，大致每省一所，在福建省取得这一地位的书院就是鳌峰书院。鳌峰书院是集教、学、研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型书院，由理学名臣、时任福建巡抚的张伯行在康熙四十六年（1707年）创建，建于福州九仙山麓的鳌峰坊，九仙山形状和巨鳌相似，取“独占鳌头”之意，鳌峰书院因此得名。鳌峰书院从创办到撤销历经近两个世纪，是当时福建省的最高学府，在师资、生源、资金等各方面所受的优越待遇都是福建省其他书院无法比拟的，其学术水平、教学治理和办学规模等都堪称当时东南第一学府。鳌峰书院作为清代培养人才的摇篮，培养的高材生有“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”的林则徐、“筹台宗匠”的蓝鼎元、“道光四子”之一的诗人张际亮等。

诸学并举

福建省是朱子理学的故乡，理学传统浓郁，在清初更是得到发扬，鳌峰书院成为汇聚全省理学精英的讲坛，形成了“士皆鼓舞振兴，理学复明”的繁荣景象。乾隆中叶后，鳌峰书院仍有浓厚的理学氛围，孟超然、陈庚焕等著名理学家都出身鳌峰，孟超然还曾长期掌教鳌峰书院。郑光策主掌鳌峰书院后，首倡经世致用之学，关注民生，议论时政。他要求学生：“一课

制举艺，一课古文论志，考辨诸体，期学者力经史之学”。陈寿祺主讲鳌峰书院时，致力于树立崇尚实学的风气，他在考课中加试经史诗赋，培养经史人才。在郑光策、陈寿祺等山长们的努力下，鳌峰书院汇集了一批向心实学的士人，出现了经世致用、经史考证、诗赋诸学并举的风气，各种学风彼此间相互联系、相互促进。嘉道年间，书院培养了一批具有高尚人格而且有实际才干的人才，如梁章钜、李彦章、陈庆镛、林昌彝、林寿图等。

在鳌峰书院的经世之才中，林则徐最为引人瞩目。林则徐考入鳌峰书院是嘉庆三年（1798年），当时书院的山长是郑光策，他要求学生树立救世之志，有目的地读书，“以立志为先，谓志定而后教有所施”。在郑光策“勤于训迪，严而有法”的教育下，林则徐饱览了经史典籍，研读范围广泛，写了大量的读书札记，后人把它名为《云左山房杂录》。林则徐还认真学习古代著名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者，诸葛亮、范仲淹、李纲、岳飞、文天祥、于谦等的英雄事迹使林则徐深受教育，培养了其对民族英雄和爱国者的崇敬感情。

致用的学问，扭转了以往诸生埋头八股制艺、只攻举业的情况，培养了传统知识分子关注现实的勇气，更具深远意义的是在学子和闽人的思想深处播下了讲求“实用”的精神。鳌峰书院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，推动了全省学风的转化，净化了地方风气，福州人博学深思、厚积薄发的风气更加浓厚，学风的改变也对福建省学者和官员用较为现实的角度应对社会危机、提出可行策略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清政府下令废除科举，广设学堂、书院转为讲授“新学”，鳌峰书院至此撤销，改为校士馆。在近两百年的历史中，鳌峰书院长期占据着福建省文教中心的位置，并代表着福建省最高水准的学术水平，久享“文藪”美誉。2009年，鳌峰书院在原书院附近选址重建，重建工程参考了《鳌峰书院志》中记载的书院全景图。鳌峰书院作为福建省育才重地，现坐落在福州格致中学旁边。现在的鳌峰书院通过面向学生开设《鳌峰书院史》、结合文旅设计游学线路等形式，使历史与现代相通相融，让教育之光得以延绵，古老的书院正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。

